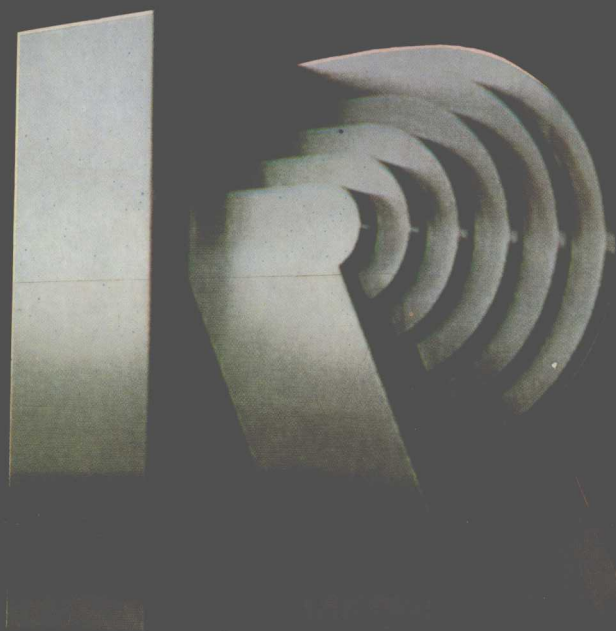


20世紀末文學作品精選報告文學卷

無效護照

●白燁 雷達 編選



20 世紀末文學作品精選中篇小說卷

無效護照

白燁/雷達/編選

4

1412

時代文藝出版社

(吉)新登字05号

无效护照 WUXIAOHUZHAO

白桦 雷达 编选

责任编辑:崔卓力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2插页
320 000字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8 000册 定价:11.00元

编 者 的 话

相对于1992——1993年的纪实、报告文学创作，这个纪实、报告文学选本似乎显得单薄了一些。这两年来，好的和比较好的纪实、报告文学作品篇幅普遍较长，而我们不能不从字数上考虑问题，以便多选几篇，力求做到“少”中见“多”。因为这一具体原因，一些象《宝钢世纪之谜》、《澳星风险发射》这样的重头作品，思谋再三，只好忍痛割爱。

留下来的六篇，几乎代表了纪实、报告文学创作的六个方面：《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属重大社会题材中的佼佼者，《商战在郑州》是改革弄潮儿的形象写照，《无效护照》以一桩蹊跷的事件观照了出国热潮，《悠闲的女人》从别样的角度揭示了变动中的社会生活；而《四个秀才一台戏》、《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则分别由历史轶事勾沉和名人记住怀旧的角度描画了正在逝去的历史的踪迹。选题重大而独到，内容厚重而引人，读后或启人认识现实，或激人反思历史，是这六篇纪实、报告文学作品所共有的特征。

因此也可以说，这本纪实、报告文学卷虽然篇目不多，却也内蕴多样，无论是它们具体呈现的方面还是它们整体构成的志向，在反映1992——1993年的纪实、报告文学创作的实际进展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代表性。

编 者

1994 元月 20 日于北京

目 录

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	卢跃刚 (1)
商战在郑州	邢军纪 曹 岩 (86)
无效护照	谭元亨 (150)
悠闲的女人	刘汉太 (248)
四个秀才一台戏	权延赤 (301)
——周扬、康生、陈伯达和胡照衡在“文革”前夕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陈凯歌 (376)

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

卢跃刚

长江是伟人和天才们施展智慧和伟力的场所，三峡工程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个世纪性的历史命题。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命题面前，我们多少有点茫然彷徨，多少有点忐忑不安，甚或多少有点恐惧和宿命感。

无论是三峡工程的赞成派还是反对派，他们都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精忠爱国，关心民族现代化工业，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肝胆相照，激烈论辩，构成了一部撼动世界的宏大史诗。

我把这部史诗叫作三峡史诗！

——题记

1992年4月3日下午，林一山略有些反常。他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中午对他来说，是个快乐的时光。每天午饭后，12点到两点，他都要一字不漏地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有的节目。可今天，躺在床上的那只高性能九波段半导体收音机似乎受到

了冷落。他下意识地摸到床边，拿起收音机，凑到耳根打开，听不一会儿，又若有所思地扔回床头。

林一山已经双目失明。他只能靠收音机保持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这位 81 岁的老人在大客厅里来回地踱着，像往常一样地镇定、熟练，可他内心的激动和焦急，却瞒不过家里人的眼睛。

30 多平方米的大客厅空旷而简单，两对旧沙发和一个长沙发，一张三屉桌。唯有东、西墙面上高挂着的几个大镜框光芒耀眼。

这些镜框似乎都在证明着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昔日的举足轻重和灿烂辉煌。

西墙上，四个大镜框依次排开：荆江分洪闸（1952 年）、湖北陆水三峡试验坝（1958 年）、丹江口水利枢纽（1958 年至 1968 年）、葛洲坝水利枢纽（1971 年至 1988 年）。这些都是林一山亲自主持的在中国水利史上惊天动地的工程。

东墙上的大镜框，正在叙述一个故事：1952 年 2 月，周恩来冒雪视察长江中游荆江大堤。周恩来在大雪纷飞中侧耳倾听着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讲述着什么……

客厅里，此刻仿佛响彻着毛泽东五十年代接见林一山时戏谑的湖南口音：“哦，你这个长江王！”

林一山则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问候毛泽东：“主席好！”

一切都仿佛近在咫尺，一切都仿佛十分遥远。

林一山常常仰首“凝视”着西墙：何时能在葛洲坝之后排上三峡大坝的雄姿？

他梦寐以求并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今天快要实现了！

他居住的北京和平门内新壁街 49 号，异常寂静。这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正屏住呼吸，等待着往东 700 米处人民大会堂

的表决。

这将决定着三峡工程的命运。

三峡工程，长期在党内、在国务院、在全国人大、在全国政协悬而未决，争论不休。赞成派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年年初开始，中央各大新闻媒介在统一指导下，对三峡工程作了大规模的正面宣传……仍然不敢保证人大代表百分之百地过半数。

如果通不过，那将是何种局面呢？

七届人大五次会议 4 月 3 日下午的闭幕式，气氛非同寻常。

会前，台湾代表黄顺兴坐在进大休息厅过道的第一张桌子旁，向中外新闻界散发了《关于三峡工程议案表决方式的动议》。

黄顺兴在“动议”中说：“按往例，国务院处理建设工程，无须提交人大会审议，然而，因为三峡工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史无前例。无论从科学技术涉及面之深广与复杂，无论对长江流域生态与环境影响之严重，无论从移民数量及工程经费之巨，施工周期之长，都堪称世界之最，举世瞩目。虽然代表们都努力认真审议此案，但由于涉及领域宽广，未知因素太多，疑问不少，审议讨论时间太短，反面资料与意见的发表不充分，对工程建设的利弊尚难有深入、正确、统一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表决这样一个重大议案，应特别慎重，应将本案作为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可通过。”

本来，闭幕式是一个轻松愉快的程序，因为在此之前，所有提交表决的“报告”、“决议”草案，事先已得到与会代表的

充分审议，“报告”和“决议”都尽可能地体现了代表们的意志，可黄顺兴把“动议”的风一放出来，闭幕式的弦便绷紧了。闭幕式成为中外新闻媒介关注的焦点。

刚一开会，摄影记者们便有意识地往台湾代表团旁边凑。

3点20分许，主持大会的万里委员长说：“现在开始表决《三峡决议》。”

黄顺兴突然站起来喊：“主席，我要求发言。”会场顿时哗然。

“大会没有安排发言程序。”万里说，“请代表们继续表决！”

黄顺兴的发言请求被拒绝后，旋即随着台湾代表、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刘彩品退席。

《三峡决议》表决结果：

赞成：1767票

反对：177票

弃权：664票

未按：25票

赞成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

万里宣布：“赞成票超过半数，《三峡决议》通过！”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三峡决议》在人民代表大会获得通过，这意味着三峡工程的兴建，走完了法律程序，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

当天，消息传开后，许多人老泪纵横，许多人设宴庆祝，一醉方休。

林一山更是狂喜。他见了我就说：“不容易呀，不容易呀！”

从1919年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利用三峡水利发电到现在，已逾73年矣！

一个工程，花了73年的时间，才走完了论证的过程！几乎

是一个世纪！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无论是赞成派还是反对派，熬到今天这种结果，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仅仅是高兴或者沮丧吗？仅仅是喜悦或者悲哀吗？仅仅是胜利或者失败吗？

在这 73 年的时间里，从 1946 年美国大坝权威萨凡奇推动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到 1958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扩大会议作出的《三峡决议》；从 1984 年国务院确定“150 方案”（即以吴淞口基面为准，海拔 150 米正常蓄水位），到 1992 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三峡决议》，惊动了多少能改变历史、主宰人类命运的伟人：孙中山、蒋介石、罗斯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风云变幻，世事沧桑。

三峡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从古至今，从内到外，上至天堂，下至地狱，近一个世纪中，人们激烈论争，据理抗辩，生出多少是非曲直，恩恩怨怨；生出多少人生蹉跎，悲欢离合；生出多少宏篇巨制，奇思诡想。

今天，我们在长江宽阔的胸膛上航行，还能强烈地感受到那些天才和伟人不朽的灵魂，从那巫山烟雨中踏歌而来，与我们结伴前行；还能强烈地感觉到三峡夹岸数百公里那山的严峻和对峙。如同两个营垒，以江为界，水火不能相容，论辩声若洪钟大吕，在山脉间回荡，可谓振聋发聩。

“三峡是‘上帝的恩赐’！”

“三峡工程是人类伟大的理想。”

“三峡工程是长江中下游防洪不可替代的方案。我们的结论是，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

然而，上面的判断和说法遭到了反对派强有力的驳难。

正是半个多世纪的激烈论辩，正反两方面意见的相互碰撞和驳难，使三峡论证的科学化、民主化得以深化和发展。

正是半个多世纪的激烈论辩，为我们揭开了“三峡史诗”的第一章。

三

《科学家》杂志在潘家铮一篇自传文章的篇首，用那种中学生作文的浪漫笔调写下了一段话：

“他将与缪斯女神的初恋和翱翔蓝天的遐想珍藏在心灵的深处，走遍祖国的天涯海角，制服一条条桀骜不驯的江河……”

其实，潘家铮压根儿不想将缪斯女神“珍藏在心灵的深处”。

我在1992年第7期《科技发展与改革》上看到了他的一篇科幻小说：《机器人的爱情悲剧》。讲的是“本来攻水工结构”，后又沉醉于计算机的向普陶教授与他制造的机器人康柯的恋爱故事。小说充满了调侃和诙谐的味道，心态十分年轻。

他的沙发靠椅紧挨着你，毫不遮饰，让你能仔细地观察他：小小的个儿，已花白了的头发，西服皱皱巴巴的，脚上那双半高跟皮鞋加上绍兴腔的普通话，多少有几分迂。当他说“我爱写小说”时，他高度近视的眼神闪耀着那种“文学青年”的真诚、热情和痴迷。我把英国科幻小说大师威尔斯的小说集送给他时，他如获至宝。“哦，威尔斯，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然后急急地翻几页，那神态，仿佛世界上没有比小说更重要的事情了。

真是不能想象，他几十年来，曾主持设计了包括新中国第一座大坝——新安江水库在内的数座大坝，发表、出版学术文章和著作六百余万字，怎么还能腾出工夫来写小说？

真是不能想象，这位 65 岁的著名大坝专家，这个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和能源部总工程师、中科院学部委员、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名誉教授重任于一身的小说迷，怎样在 1986 年 6 月至 1988 年底两年半的时间里，主持了世界瞩目的三峡工程重新论证；怎样在各不相让、尖锐对立、火药味很浓的气氛中，正襟危坐，在全国相关领域 412 名一流专家学者面前，保持着应有的“长者”风度。一位老先生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决反对三峡工程上马。发言完后，潘家铮说：“我来归纳一下刚才发言的要点……”没想到老先生当堂大声喝道：“不要你归纳！”十分不给面子。潘家铮顿时噤声。

真是有点难为我们的小说家。他曾说过，他不写小说搞水利纯属“历史的误会”，“自幼热爱水电建设”云云“更是与事实相去万里”！他一听到别人说他为中国的水电事业“卓有贡献”，“总是面红耳赤”。

坦率得不能再坦率了。

读了他刚出的《春梦秋云录》，一大厚本，30 万字，字里行间都让你感觉到，搞水电，是为了生计，是撵鸭子上架。

在党内外的强大压力下，1986 年中共中央 15 号文件，要求水电部组织各方面专家，重新论证三峡工程，并重新提出可行性报告。作为当时的水电部总工程师，潘家铮便当然成为论证领导小组的技术总负责。

谁都清楚，这是三峡工程最后一次机会了，专家评议的结果，将在技术和理论上决定三峡工程的命运。

潘家铮也很清楚，他被卷进了中国一个既敏感又错综复杂的大漩涡里了。

由“文学梦”而“三峡梦”，成为历史赋予他的唯一选择。

四

这种选择是突如其来的。

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三峡决议》后，由于毛泽东的犹豫，三峡工程一直处于冷却阶段，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虽然小有起伏，仍然没成气候。

1982年底，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机。

11月24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二十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当汇报到为适应翻两番的要求，准备兴建三峡工程时，邓小平即表态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之后，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都先后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形成了三峡工程党内最高决策层从未有过的高度统一。

这就出现了所谓“150方案”。具体的指标是，可有防洪库容140多亿立米，装机1200万千瓦，移民不超过40万人。尤其是移民比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175方案”（吴淞基面，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的113万移民减少近三分之二。

1984年国务院批准“150方案”，并要求即刻进行“三通一平”等前期准备工作，筹组三峡特别行政区，争取1986年正式开工。

与此同时，三峡工程著名的“缓上派”李锐上书党中央，对三峡工程立即上马的方针，对三峡工程是否合理，对泥沙、航运、移民等重大技术问题，提出了全面的质疑。

这些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促使中央对三峡方针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查。

1986年，中央决定撤销已工作运转了快两年的三峡省筹备组，成立国务院三峡经济开发办公室，并责成水电部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重新论证和审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潘家铮走上了三峡的历史舞台。

这种局面，他是很难应付的。

五

围绕三峡工程，几十年来的所有重大技术问题，由于各种政治斗争积淀下来的恩恩怨怨，眼下都一古脑地搬到了桌面上，问题和矛盾全部公开化了。许多几十年彼此知名而未曾谋面的对手，今天终于坐到了一块，刀兵相见了。

专家论证结果：403：9。

论证报告有九位专家十人次没有签字。

主上派以压倒多数的结果，为半个多世纪的三峡工程论证拉上了沉重的帷幕。

然而，论证结束了，论争并没有结束。

况且，论证过程中，反对派虽然是“极少数”，也对主上派构成了威胁，也向主上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使主上派不能像许多工程那样马马虎虎，顺利过关。

三峡工程，严格地说，是个严肃的科学问题，随着时代的推移，历史的变迁，渐渐地不那么单纯了。

论证过程始终笼罩着政治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历史的阴影，“对台戏”的幕后，总有些不尴不尬不干不净的东西窥视着。

潘家铮作为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似也看出了些端倪，心里恼火，却也无奈。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由于“左”的影响，领导说了算，严重损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热情，给

两代知识分子留下了许多惨痛的经验教训。如三门峡工程。潘家铮大声疾呼：为什么不能进行同志式的讨论？！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在大会发言后即转身离开会场。他不愿听对方的反驳或者说明。

“不用听，所有的解释都是陈腔滥调！”另一位老先生断然说。

潘家铮心里很难过。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呢？

七届政协五次会议上，一位记者采访某著名水利专家，请他谈谈三峡工程。他反问：“你怎么看？”记者说：“眼下国家财力匮乏，能不能缓上？”

“放屁！缓上就是不上！”记者一愣，没想到这位受人尊重的专家也如此粗鲁。

一位老先生说，气功能够把降雨云团阻挡住，让暴雨降到长江险段以外别的什么地方。

这种以“空中调水”来取代三峡防洪的方案，受到许多科学家的嘲笑和挖苦。

这时，一位老专家为方案的提出者挺身辩护，他在列举了人工降雨灭掉1987年大兴安岭山火后，说：“如果长江上游各支流星罗密布的水库群，通过几代人的努力都修起来，把暴雨人为地迫降到该处，不是可以起到治水作用吗？个别人……除掉缺乏这方面的科学知识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呢！”

一位水利专家提出了“160方案”。

而一位反驳者即说这是一种“缓兵之计”，与李锐的缓上三峡工程同出一辙。并向与会者暗示，这种“缓兵之计”有某种政治涵义。

一个事关民族大业的科学问题随着政治动向而发生了转换。

反对派向主上派扔出了白手套。他们在各种会议上顽强地表达着意见，影响着决策。

主上派也发起了反击。

1987年，原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田方与该所研究员林发棠合作编出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第一次汇集了反对派的意见与公众见面。而计委一位领导以“老朋友”的口气向田方传达了“上面的意思”，希望停止公开发行《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

这种压制出版反对意见的作法，适得其反。

因为这本书由国家科协主席、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作序，其中的作者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谈的问题都没有超过三峡工程的范围。

这一压不要紧，紧接后面，又“压”出了《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压”出了《长江，长江》这本更加轰动的书来。

而某些单位和个别人，却把此事上纲上线。在1989年9月向《长江，长江》中被采访的专家学者所在单位或原单位机关党委寄信，并提供了相关材料，供“单位在清查和考察干部时参考”。

这种用政治判断、用告密来解决学术争端和不同意见的“文革”式的做法，当然遭到了许多单位领导人的抵制。理由很简单，这些反对意见由来已久；更重要的是，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专家学者拳拳爱国之心不容怀疑。观点是否正确，另当别论。

就拿孙越崎老人来说，1985年已是92岁高龄，却以惊人的毅力，与其他七位专家一起爬山涉水，对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38天的实地考察。目击者说，孙老不要人搀扶，精神矍铄，真是难以想象。

对反对意见的作用评价很高的潘家铮，听到那些过格的故

事后，直皱眉头。

他对两边的过激言行都有看法。

他作为主上派的关键人物，实际上扮演了两种角色。一种是科学家和论证技术总负责人，必须牢牢地站在科学的和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听取意见，并将正反两方面意见的有益成分归纳吸收进来，为决策提供没有任何偏见的参考；一种是艺术家，对三峡，他有态度，有梦想，有激情，而梦想与激情被前一种角色的社会要求给压抑了。他必须寻找一种渠道来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他找到了文学。

1991年，他在《大江文艺》上发表了报告文学《三峡梦》。

六

为了实现“三峡梦”，潘家铮也拿起了剑，向对方扔出了白手套。

潘家铮首先做的梦是一个恶梦：

他乘时间机器，穿过时间隧道，来到同治九年（1870年）的湖北宜昌城头。他看到，“长空漆黑如墨，大地阴雨怒号，整个四川、湖北笼罩在暴雨云团之下。那雨，倾盆倾缸，无休无止，百川千溪，各汇长江。江水日升夜涨，四天之内长江流量由四万秒·立米猛涨到十万秒·立米。城里乡下，不论是官吏百姓，富豪平民，都面如死灰，烧香磕头，祈求上苍开恩。”

半夜里突然锣声四起，哭天喊地，“大水进城了！”全城乱作一团。他混杂在逃难的人群里面，拼命奔跑。“可这两条腿又怎能逃得出这全城灭顶之灾呢！一个巨浪打来，我被卷入浊流之中。等我再睁开眼，我已在空中飘荡。我明白自己已成为百